

1895-1900年

日本对华政策 演变研究

唐奇芳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1895—1900年

日本对华政策 演变研究

唐奇芳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895~1900年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研究 / 唐奇芳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012-4389-1

I. ①1… II. ①唐… III. ①对华政策—研究—日本—
1895~1900 IV. D822.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1209号

责任编辑
文字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胡孝文
张 萱
刘 喆
马莉娜

书 名

1895~1900年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研究

1895~1900 Nian Riben Duihua Zhengce Yanbian Yanjiu

作 者

唐奇芳 著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880 × 1230毫米 1/32 8¼印张

字 数

2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12月第一版 201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389-1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一、问题缘起.....	1
二、中心假设.....	3
三、主要内容.....	5
四、篇章结构.....	10
五、文献回顾.....	13
六、研究方法.....	17
七、资料来源.....	18
八、写作意义.....	19
第一章 甲午战争前的日本对华政策.....	22
第一节 两个并存国际关系体制下的中国与日本.....	22
第二节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 建立中日对等外交关系	27
第三节 “脱亚”与“兴亚” ——日本对华外交路线的源流.....	32
第四节 以朝鲜问题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扩军备战.....	40
小 结.....	49
第二章 影响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因素.....	51
第一节 甲午战争给日本对华政策带来的影响.....	51

第二节 日本对华政策制定中主要矛盾的变化.....	57
第三节 日本对华政策制定中的诸要素.....	61
小 结.....	64
第三章 “三国干涉还辽”后的日本对华政策.....	65
第一节 “三国干涉还辽”与日本对华政策 制定模式的变化.....	65
第二节 日本在对华侵略上暂时采取收缩政策.....	70
第三节 日本提高国力, 企图改变被动地位.....	77
小 结.....	86
第四章 瓜分中国狂潮与日本的对华政策.....	88
第一节 日本利用瓜分中国狂潮实施对华接近.....	91
第二节 中国问题成为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中心.....	97
第三节 日本对华政策中的“两手准备”方针.....	106
小 结.....	108
第五章 戊戌政变与日本对华政策.....	111
第一节 日本政府对戊戌政变的反应.....	113
第二节 民间“亚洲主义”者对维新派态度的转变.....	123
第三节 “中国保全论”的提出.....	137
第四节 两条对华政策路线的接近.....	148
第五节 日本对华政策性实行模式的出现及其特征.....	159
小 结.....	162
第六章 义和团事件与日本对华政策.....	164
第一节 日本政府在义和团事件第一阶段的政策.....	166

第二节	日本政府对出兵镇压义和团的策略和计划.....	171
第三节	日本政府出兵策略的实施和目标的达成.....	175
第四节	日本对华政策制定向主动前瞻模式转化.....	180
第五节	日本对华政策纲领 ——《北清事变善后策》的提出.....	185
小 结		202
结 论		204
参考文献		210
中文文献		210
日文文献		216
英文文献		227
附 录		230
戊戌政变后中日结盟事件始末及其分析.....		230
试析日本早期在华情报工作.....		245

绪 论

一、问题缘起

1871年中国和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自此两国之间建立了近代外交关系。尽管从最终确定的条款来看，《中日修好条规》应该算作一个平等条约，中日关系处于对等的地位。但日本在最初提出缔约时，却要求比照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梦想从中国夺取同样的特权，只是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未达成。这是日本企图以双边条约的形式实现其对中国侵略扩张的尝试。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思想由来已久，其主要脉络是：先占领朝鲜，然后以此为跳板，对中国大陆进行侵略。从近世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到“七·七”事变的全面侵华战争，这种侵略思想一直根植于日本统治者的头脑中并被变本加厉地付诸实施。近代以来日本在东亚的侵略扩张活动以甲午战争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朝鲜为主要侵略目标的第一阶段和以中国为主要侵略目标的第二阶段。

在第一阶段，日本侵略活动的目的是消除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把中国这个日本最大的障碍和敌人从朝鲜清除出去，将朝鲜纳入日本的控制之下。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确定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备扩张计划，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

就是以朝鲜问题为中心的扩军备战政策。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由于政治腐朽、国力衰微而被日本一举击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仅达到了让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的目的，还从中国割去辽东半岛、台湾等大片领土作为殖民地，并且向清政府勒索白银两亿两，给中国造成了空前的损失。至此，日本第一阶段的侵略目标超额实现。日本在东亚侵略扩张活动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并直接转入第二阶段的对华侵略。

截至《马关条约》签订，日本在东亚侵略扩张计划的推行，一直都是按照其传统的构想：把主要的交涉对象定为中国和朝鲜。换句话说，日本在制定以朝鲜问题为中心的对华扩军备战政策时，主要的考虑因素只在于中国。这个时候西方列强虽然早已开始在东亚展开侵略，但是对于中日之间围绕朝鲜问题的交涉与战争，它们并没有太深的介入。日本在东亚侵略扩张活动的第一阶段中，并没有遇到与西方列强发生较大冲突的问题。

但是，当日本进入在东亚侵略扩张活动的第二阶段，即对中国的侵略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遭到了重大打击。西方列强中的俄德法三国联合起来，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返还中国。这些西方列强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而是因为日本对中国的独占性侵略行为损害了它们的在华利益。

这样一来，日本的对华侵略就遇到了一个重大的矛盾：即日本对中国独占性的侵略扩张目标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利益的矛盾。“三国干涉还辽”就是这一矛盾最初也是最典型的体现。

这个矛盾是日本在过去的侵略经历中从未遇到过的。面对这一矛盾，日本绝不会改变对中国的独占性侵略目标，但也没有力量改变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的现实，这一点，对于野心勃勃的日本来说是痛苦的。况且，随着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弱点的彻底暴

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夺取了垂涎已久的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等与西方列强同样的特权，得以加入侵略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从理论上来说，日本在对中国的侵略中获得了与西方列强的“对等地位”。然而实际上，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力还远不足以和西方列强相抗衡，无法真正参与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并没有完全的“对等地位”。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日本和西方列强围绕中国的争夺是一种序列博弈，西方列强处于主动地位，而日本处于被动反应的地位。

当日本处于被动反应地位时，它的对华政策是无法按预定的计划来发展的，而只能是对形势发展予以回应。

但是，从一开始，日本就在有意无意地采取手段改变这种被动地位，一方面增强自身的国力，这是为了提高在博弈中地位的根本筹码；另一方面等待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中出现对自己有利的机会，这是为了对筹码进行更加充分的利用。

义和团事件发生后，西方列强在镇压义和团运动时兵力上出现巨大缺口，不得不依赖于和中国距离最近的日本出兵。日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大量出兵占据八国联军中的主力地位，并且在对义和团的镇压中格外疯狂残酷，充当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日本的表现获得了西方列强的认可，初步达到了获得“对等地位”的目的。日本在博弈中的被动反应地位得到改变后，便开始主动地制定明确的对华政策纲领。

由此，可以得到本书的中心假设：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扩军备战政策的制定，属于主动前瞻模式。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是一种被动反应模式，它的对华政策与其说是按预定的计划来发展的，毋宁说是对形势发展的回应。然而，到了义和团事件中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开始又转向主动前瞻模式，明确地提出了对华政策的纲领。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在于日本国力

的增强，另外还有东亚国际关系形势发展为日本提供的有利机会，以及日本政府对机会充分运用的策略技巧。

三、主要内容

1. 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属于主动前瞻模式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统治者就继承了传统的侵略思想，对中国和朝鲜抱有独占性的侵略扩张野心。但是，甲午战争前围绕朝鲜问题的日本对华扩军备战政策并不是从最初就明确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

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政府中不断出现对中国和朝鲜进行侵略的叫嚣，如西乡隆盛等人的“征韩论”。日本政府也多次发动了对邻近地区的侵略活动，包括侵略朝鲜的“江华岛事件”、吞并琉球、直接侵略中国本土的“台湾出兵事件”等。但是，这些侵略活动并没有一个明确固定的政策作为指导，只是从传统的侵略思想出发，企图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实现日本的侵略利益。

以朝鲜问题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扩军备战政策的明确，是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其背景为日本经过西南战争等事件，稳定了国内政治，建立起现代化的军队，并且初步确立了天皇专制的统治体制，日本政府的中央集权得到实现和加强。于是开始制定系统的对外侵略扩张计划。从1880年11月时任参议的山县有朋的《进〈邻邦兵备略〉表》开始，到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的《清国征讨方略》，再到1890年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的“利益线”演说，日本的对华扩军备战政策日益明确。

此时，日本在东亚的侵略扩张活动处于第一阶段，这一阶段

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是属于主动前瞻模式的。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扩张，主要敌人只有中国。日本在制定对华政策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也主要在于中国。中日两国在外交上处于对等地位，即使从国力的角度来讲，日本明治维新的近代化进程虽然刚刚开始不久，国力还很弱小，但由于清政府力量的衰落，日本政府在制定侵略扩张政策时对中国的国力并没有太大的顾虑。因此，日本在围绕朝鲜问题和中国的博弈中处于主动地位。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过于腐朽衰弱，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对华扩军备战政策顺利推行的结果。

2. 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政策制定属于被动反应模式

甲午战争后，日本在东亚的侵略扩张活动进入第二阶段，中国成为主要侵略对象。但是，日本侵略中国所遇到的主要矛盾并非日本和清政府的矛盾，而是日本和同样在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的西方列强的矛盾。日本对中国所进行的独占性侵略扩张，与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发生了冲突。

“三国干涉还辽”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双方围绕侵略中国的博弈过程的开始。“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在与西方列强的博弈中完全处于被动反应地位。由于军事力量在甲午战争遭到了巨大的消耗，日本无力和俄、德、法三国在远东的强大舰队进行对抗，也没有其他任何措施与西方列强抗衡，于是从中国勒索了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作为“补偿”条件后，无可奈何地返还辽东。

“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变成了被动反应模式。尽管日本对中国的独占性侵略扩张目标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却无法为实现这个目标制定明确的政策并加以执行，只能根据西方列强在中国争夺的形势做出反应，在密切观察列强动向的基

础上寻找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在日本政府关于中国问题的意见中，“随机应变”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当然，日本绝对不甘心居于这样的被动地位。所以，从一开始，它就“卧薪尝胆”，扩充军备，提高国力，采取措施力图改变被动状态。

（1）面对“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国在中国的扩张攻势，日本采取收缩政策。

在西方列强中间，和日本矛盾最为突出的是俄国，双方都把朝鲜和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作为侵略扩张的重点。在西方列强中，日本最为关注的是俄国的动向，而俄国自从甲午战争后也一直对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侵略野心采取遏制政策。

“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国加强了在中国的势力扩张。俄国发起“俄法洋款”借款给清政府以支付《马关条约》规定的对日赔款，借此拉拢清政府。清政府内部产生了亲俄情绪，不少人提出“联俄拒日”主张。最终俄国诱使清政府签订了具有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性质的《中俄密约》，使俄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大大增强，并且获得了修筑东清铁路的特权。同时，在朝鲜，俄国也在与日本的争夺中居于上风。

面对俄国的扩张攻势，日本无力对抗，只能在对中国的侵略中暂时采取收缩政策。这段时期日本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建设上，扩充军备、提高国力。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从中国攫取经济利益，为军备扩张提供财源。

（2）日本从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寻找机会，实现在中国的扩张。

1897年底，从德国占领胶州湾开始，以夺取租借地为标志的瓜分中国狂潮发生。如果中国遭到分割，日本的独占性侵略扩张目标将难以实现，日本政府对此十分焦急。但同时，瓜分中国

第一阶段的对华政策基本上仍属于被动反应模式。对于出兵镇压义和团，日本政府有两层目的：第一层是保持与西方列强的一致行动，预备在它们借义和团事件瓜分中国时攫取利益；第二层是利用出兵的机会正式参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竞争，引起西方列强对日本的重视，使日本获得在与西方列强交涉中的发言权和主动性，为最终实现独霸中国和东亚的目标服务。其中第二层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从被动反应模式向主动前瞻模式转化的关键。

为了实现第二层目的，日本政府制定了出兵的总策略：日本绝不主动提出出兵，而是坐等西方列强主动上门请求日本的援助。日本政府根据这一策略又制订出详细的出兵计划，并且通过外交活动推动计划的执行。最终，出兵计划得以顺利实施，第二层目的得以实现。从出兵总策略的层次来说，日本的政策制定是属于主动前瞻模式的。这里的原因在于，在镇压义和团的出兵问题上，西方列强的兵力巨大缺口和日本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使得日本处于博弈的主动地位。

义和团事件第一阶段结束时，日本利用出兵初步获得了与西方列强在争夺中国活动中的“对等地位”，摆脱了在博弈中的被动反应地位，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转变为主动前瞻模式。这个转变马上就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中体现出来。《北清事变善后策》是针对第二阶段列强分赃活动的议和会议提出的，但其内容的核心对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华政策进行总结，并且指出此后对华政策发展的方向，这是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华政策的纲领，也表明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转化为主动前瞻模式。

4. 日本对华政策从被动反应模式转化为主动前瞻模式的原因

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国力的提高。到义和团事件时，日本从甲午战争后开始的军备扩张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因为国力提高，日本才能够利用出兵这一筹码；也因为国力提高，日本才敢于将出兵当做筹码。

第二个原因在于东亚国际关系形势提供的机会。西方列强缺乏足够的兵力来镇压义和团运动，要么是来不及从遥远的本土调兵，要么是无从海外殖民地调兵。日本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西方列强主要依靠的兵力来源。西方列强尽管怀疑日本对中国怀有独占性的侵略扩张目标，但迫于形势不得不主动向日本请求出兵。

第三个原因在于日本的政策技巧。事先凭借对国际关系形势的密切观察，日本政府比较准确地预测了义和团事件的发展方向，也发现了西方列强在兵力上的巨大缺口，总之对事态的认识比较正确、全面。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制订出了关于出兵详细可行的计划，并且采取外交上的辅助措施推动其顺利实行。

上述三个原因结合起来，使日本获得了与西方列强在对华争夺中的“对等地位”，在博弈中不再处于被动反应地位。

四、篇章结构

本书在结构上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是对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发展进行总结。首先对甲午战争前东亚国际关系形势进行分析，即存在两个并立的国

际关系体系。中日之间建立了对等的外交关系，日本国内在对华政策的思想上，出现了“脱亚主义”和“亚洲主义”两种路线。出于控制朝鲜的目标，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确立了以中国为假想敌，扩充军备的对华政策主线，直到甲午战争。

第二章是对日本对华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因素包括日本对自身国力的信心、对东亚国际关系形势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命运走向的判断。无论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属于被动反应模式还是主动前瞻模式，这些因素都是相同的。列举这些因素，是为了分析日本在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事件时制定对华政策所考虑的内容，属于微观层次，与推动日本对华政策制定从被动反应模式向主动前瞻模式转化的宏观原因是不同的。

第三章是关于“三国干涉还辽”后的日本对华政策。这一章阐述日本对华政策制定的被动反应模式的成因及其作用的开始。从时间上来说，即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到1897年底瓜分中国狂潮发生之前这段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日本在中国采取收缩政策，以落实《马关条约》中获得的特权，攫取经济利益为主。这一时期日本在东亚侵略扩张上的注意力，仍然停留在朝鲜问题上，企图尽力维持在朝鲜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日本开始为改变与西方列强关系中的被动地位而采取措施，以俄国为假想敌进行军备扩张，提高国力。

第四章是关于瓜分中国狂潮和日本对华政策。这一章是对被动反应模式最为典型的体现的分析。瓜分中国狂潮使日本在华独占性侵略扩张目标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日本和西方列强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活跃。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使日本对它在中国的独占性侵略扩张目标的实现产生了焦虑，从而把在东亚侵略扩张上的注意力从朝鲜问题转移中国问题上。西方列强争夺的加剧也给日本外交带来了机会，俄国和

英国都对日本进行拉拢，日本趁机向俄国提出“满韩交换”，企图获得俄国对日本在朝鲜优势地位的承认。同时，这个危机也给日本带来了打破战后调整期间中日间的冷淡局面、而与中国接近的机会。他们选择长江中下游的实力派督抚——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为突破口，以帮助其进行军事改革等条件进行拉拢，企图培养亲日势力，扩大日本的在华影响，与清朝中央政府中的亲俄势力相掣抗。日本形成了“两手准备”的对华政策基本方针，这是被动反应模式在日本对华政策制定中最为典型的体现。

第五章是关于戊戌政变与日本对华政策。这一章主要阐述戊戌政变对日本对华政策较为深远的影响。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戊戌政变可能为西方列强提供瓜分中国的借口，于是它遵循“两手准备”的基本方针进行应对。因此，对于本书的中心假设来说，戊戌政变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戊戌政变导致日本的民间亚洲主义者改变了对维新派和中国命运走向的判断，从而在中国问题上的认识与政府逐渐一致。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原本存在的“脱亚主义”（政府）与“亚洲主义”（民间）两条路线开始统一，并且出现了政府与民间在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的新的合作模式——东亚同文会。“脱亚主义”与“亚洲主义”认识上的接近，是后来成为日本对华侵略扩张政策指导思想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开端。从这个角度来说，戊戌政变对日本对华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六章是关于义和团事件与日本对华政策。这一章是本书的关键，主要是为了阐明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从被动反应模式到主动前瞻模式的转化。义和团事件的发生给日本带来了提高国际地位，加入列强队伍的良机，日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通过出兵充当八国联军的主力 and 急先锋，获得了预期的效果。自此日本大大加强了在对华政策上的信心，明确提出了纲领性的文件《北清

事变善后策》。其中对甲午战争以来的对华政策进行总结，明晰并肯定了此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即以保全中国现状为主，同时也做好瓜分的准备，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建立日本的势力范围，也就是“保全中国”与“北守南进”的结合。这个文件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政府首次提出对华政策的纲领，标志着日本对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初步确立。同时，日本对华政策纲领的明确提出，也体现了政策制定开始转化为主动前瞻模式。

最后是结论。

五、文献回顾

本书的研究范围是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事件之间的日本对华政策演变，与本书有较深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明治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发展的研究。题目直接涉及明治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发展的研究并不太常见，比较多的是关于同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展以及大陆政策发展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内容，都与明治时期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发展多少相关。关于日本对华帝国主义的发展，自战后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不胜枚举，其中以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最为集中。比较有影响的著作，较早的有井上清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1970年）、依田熹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1965年）和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年），比较新的研究成果包括井口和起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与东亚》（2000年）、藤村道生的《日清战争前后的亚细亚政策》（1995年）。关于日本明治时期大陆政策发展的研究包括沈予的《日本大陆政策史》（2005年）、陈丰祥的《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1992年）安冈昭